

《养正遗规》中的蒙童教术

冯露露 孔洪恩

中国古人历来注重开蒙教育,所谓“少成若天性”即是在强调少时习养对人生的长久影响。围绕着幼儿启蒙这一主题,历代学者先后编撰了许多启蒙经典,如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声律启蒙》等。在这些灿若星辰的蒙学文献中,《养正遗规》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部著作。它由清人陈宏谋于乾隆年间(1739年)纂辑而成,分上、下两卷,另补一卷,汇集自汉至清尤其是宋以后朱熹、方孝孺等多位名儒关于养性、修身、儿童启蒙教育、读书学习方法的相关著述,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且有名可查的蒙童教学方法汇编著作。它既是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,也是清末中学堂教材。

陈宏谋(1696—1771年),字汝咨,号榕门,广西临桂(今属桂林)人,雍正元年(1723年)中进士,历任江苏按察使、湖南巡抚、云南布政使、工部尚书等职,学识渊博、著述颇丰,有“岭南儒宗”之称。陈宏谋为官40余年,足迹遍布10余省。在从政之余,他全面细致考察所在地区民众教育、日常风俗、基层治理和为官治吏等情况,针对性地精选前人关于养性修身、治家教育和为官从政方面的经典言论,整理成《养正遗规》。



学之所向在为人

《养正遗规》中的“养正”一词,源于《易经》第四卦“蒙”卦:“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”“蒙”意为蒙昧幼稚无知,是幼儿起始的蒙童时期。在蒙童的时候教其正心修身,涵养浩然正气,这是至高无上的功德。在《养正遗规序》中,陈宏谋开宗明义指出,“天下有真教术,斯有真人才。教术之端,自闾巷始。人材之成,自儿童始”。他认为天下有好的教育方法,才会有真正的人才。教法的起点要从乡里街巷开始,人才的培养则要从儿童开始。教育者不仅要自己明白为何教人,也要让孩童知道为何学习。对此,陈宏谋在总结朱熹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中“教人为学之意,莫非使之讲明义理,以修其身,然后推己及人……非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”和王守仁《王文成公训蒙教约》中“今教童子,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要务”基础上,鲜明指出“学也者,所以学为人也”。学习是为修身做人而非功名利禄,要首先敬爱父母、友爱兄弟姐妹,涵养人伦之义,这一点自当从小谨记。

确定求学目的后,教与学的首要步

骤是什么?《颜氏家训》讲,“有志尚者,遂能磨砺,以就素业。无履立者,自兹惰慢,便为凡人”。读书学习先要立志才能知所趋附,但要立长志,不要常立志。同时,立志还要高远,《高提学洞学十戒》中便指出,学习十戒之一便是戒“立志卑下”,读书学习不能满足于博闻强识而是要学圣求贤以为天下。

学有所成贵在法

立志求学是第一步,求学有方是第二步。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学精、学透这一目的,陈宏谋在分析贤者经验基础上提炼选择了很多精辟门路。

一是要勤。《颜氏家训》讲,“自古明王圣帝,犹需勤学,况凡庶乎”。大抵世间天才之人仍属少数,因此勤学苦练仍是学习捷径。而对于如何把书本掌握熟练这一问题,《唐翼修父师善诱法》提出方法:“欲学生书熟,必当设筹以记数便。声韵调熟,则文章自有音律。”正所谓“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”。要想方设法通过读书遍数的计算,来激励监督孩童不偷懒耍滑,这样才能达到熟能生巧。

二是要精。《陆清献公示子弟帖》中

讲,“汝读书,要用心,又不可性急。熟读精思,循序渐进,此八个字”。读书求学是铁杵磨成针的过程,所以《张杨园学规》中讲“功夫须是绵密。日积月累,久自有益。勿急躁,毋间断”。而如何做到在精中熟,在熟中精?《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》中讲,“每大段内,必分作细段。每细段,必看读百遍”。

三是要行。张伯行在《张清恪公读养正编要言》中讲:“读书不须多。读得一字,行取一字。读得一尺,不如行得一寸。”只读不做只是纸上功夫,无法长久,更无法领略圣贤道德要义。

修身礼仪需谨记

除了学习圣贤知识,教育孩童还需要在学礼上下功夫。陈宏谋选取真德秀的《真西山教子斋规》,意在说明学习是一个由浅入深、完整系统的过程,要做到“学礼、学生、学行、学立、学言、学揖、学诵、学书”。对此,朱熹在《童蒙须知》中讲,“夫童蒙之学,始于衣服冠履,次及言语步趋,次及洒扫涓洁,次及读书写文字,及有杂细事宜,皆所当知”。在此基础上,陈宏谋认为如果《童蒙须知》是做父兄的用来教育子弟,那么《程董

学则》《高提学洞学十戒》则是自10岁起离家求学的弟子应遵循的。前者告诉我们学在私塾要严格地进行朝夕和望日的礼仪,从打板起床洗漱到登堂焚香拜师长都要心存敬畏;后者则在讲集体学习时需要注意的“陵忽师友”等“十戒”。以上讲的是学堂公共场合的规矩,如果具体到孩童自身,陈宏谋认为其自身要做到谨遵礼节、谨言慎行、言行有度。对此,他选取《屠提学童子礼》,其中给出了站坐行食的规矩,“凡立,须拱手正身,双足相并。凡坐,须定身端坐,敛足拱手。凡走,两手笼于袖内。凡饮食,需要敛身离案,毋令太逼”。此外,《陈定宇示子帖》还讲,“每日早起晏眠,莫妄出,并与人闲说话,惹是非。能守得勤谨二字,万万无失”。

《养正遗规》皆为文言,文字虽浅,意味深远,情义拳拳,实为今日之父兄、师长启蒙孩童必读之书。然而这样重要的一部典籍,因为种种原因,现代熟知的人并不多,实为可惜。故分析其中精义,发掘其启蒙价值,这也正是本文研读深悟、以期探讨的初衷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)

三贤清韵传廉音

王丹

在山东省青州市这座古城内,循“廉”音而行,必定要先走进位于范公亭公园的“三贤祠”,在唐楸宋槐、苍松劲柏中,回望一段激荡的历史,倾听一个个勤政爱民的故事,感受那一股纯净而又温暖的三贤清韵……

三贤指的是富弼、范仲淹、欧阳修三位先后出任青州知州的北宋名臣。他们虽任职时间并不长,但都是心系黎民、清廉自守、广施德政,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善事义举,深受感念和爱戴,所以才被百姓敬称为“青州三贤”。

北宋庆历七年(1047年),富弼以资政殿大学士加给事中的身份知青州,从此奏响了三贤清韵的序曲。当时,恰逢河朔一带洪水成灾,数十万流民奔涌至青州境内,富弼毫不犹豫动员所属各州县腾挪公私房舍10万余间,妥善安置灾民。

有人劝富弼谨慎行事,不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的灾民,万一出事,不好交代。他坚定回应,岂能以一己之安危,而弃数十万性命不顾呢?富弼把灾民分散安置,组织当地官吏分区管理,并且劝说本地富户捐献粮食,开仓赈粮,

供应灾民。他同时下令,山林坡泽中可供食用的,任凭灾民采集。

第二年夏天,青州一带粮食丰收,富弼据情为灾民发放归家口粮,救活了大量灾民。不仅如此,富弼还从灾民中招募选拔了一批青壮年当兵。富弼推出的这一系列赈灾方法,简便易行,周密可靠,效果很好,此后各地纷纷效仿。

朝廷知道富弼的功绩后要奖赏他,他坚辞不受,认为救灾济民是地方官的职责,能救活数万人,胜过24岁当宰相。由此可见其爱民胜过官职的高尚情怀。富弼担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重臣,史称其公忠直亮,功成退居,朝野倚重,有大臣之风。他一生做过许多事情、取得很高成就,但从不夸耀,对青州救济灾民却多次津津乐道,并把此事写成《青社赈济录》一书。富弼在青州任职三年多,政绩显著、深得民心,他离开青州时,百姓在瀑水涧旁修筑“富公亭”以作纪念,后改建为“富公祠”。

皇祐三年(1051年),范仲淹接替富弼任青州知州,此时他已是迟暮之年,但他不顾年老体弱,带病处理繁杂的公务,还经常微服察访黎民百姓,体恤民情。范仲淹上任之初,青州粮食价格还

是很高。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,青州百姓的皇粮要跑到博州去交纳。青州粮价昂贵,再加之路途遥远,成本很高,百姓不堪其苦。

范仲淹经过调查,知道博州的粮价比青州便宜许多,于是改变以往的做法,让青州百姓按照正常年景的粮价交钱给官府,以款代粮,然后派人去博州就地购粮,很快就完成了预定的皇粮任务。事后,范仲淹还令人把购粮剩余的钱款退还给百姓,青州百姓感动不已,“因立像祠焉”。当时,青州流行一种眼病,蔓延多年,难以治愈,困扰百姓。范仲淹亲自搜集民间药方,利用清澈的阳河泉水调制成为“白丸”,为不少人治好了眼病。为此,范仲淹把调制药丸的清泉命名为“醴泉”,并在醴泉上建造了一座亭子,后人感念范仲淹的功德,将此亭称为“范公亭”。现此亭就位于三贤祠迎门处,参观的人们一走进祠门,便能将历史定格在范公汲水治病的场景。

皇祐四年(1052年),64岁的范仲淹被调往颍州(今安徽阜阳)赴任途中溘然长逝,但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拳拳为民之心和家国情怀

一直长存并绵延流长,为中华优秀人文精神和清官文化的积淀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北宋熙宁元年(1068年),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,他是继富弼和范仲淹之后,到任青州的又一位贤臣。他到青州后,奉行“宽简而不扰”的施政方针,刚到三五天,官府事情已减去一半;两月之后,“官府如僧舍”;两年之后,出现了“年丰稔,盗讼稀少”的景象。有人问欧阳修,为什么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呢?欧阳修说,如果以放纵为宽,以略为简,那么政务就会弛废,百姓就受其害。我所谓的宽,不去做苛刻而急切的事;所谓简者,不做那些繁杂琐碎的事情罢了。这种宽简不扰,是自己不求政绩、不求声誉,单求与民方便、休养生息。

政声人去后,丰碑在心间。如今的三贤祠,院内唐楸宋槐,老干虬枝,沐千年风霜,依旧荫翳蔽日、生机盎然,继续守望着三贤,荫泽着世人。正如三贤清廉自守的高尚品格、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、勤政爱民的嘉言懿行一样,历久弥新,熠熠生辉,如黄钟大吕一般,一直教育、警醒、砥砺着后来人。

(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